

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 晚清至1930年代的北戴河*

潘淑華**

摘 要

本文通過位於河北省臨榆縣的著名海浴場北戴河，分析民國時期海濱及海浴在中國城市菁英及民眾新興的休旅文化中之位置。由於清末鐵路發展及西方人的經營，北戴河從無人知曉的地理「空間」，逐步演變成擁有獨特性格、名聞中外的「地方」，中國人對海濱的用途和價值有全新的認知。1910年代，以朱啟鈐為首的中國城市菁英，組成「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在聯峰山建構富中國傳統特色的人文景觀及休閒文化，賦予北戴河一層新的意義及地方感。1920年代，北戴河在中國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海濱旅遊勝地。雖然能夠到北戴河旅遊避暑的主要是上流人士，但隨著有關北戴河的旅遊指南及遊記愈來愈多，未能親身到北戴河遊覽的民眾，也能通過旅遊出版物想像北戴河的景觀和意義。而公益會所經營的空間，既象徵階級的排他性，同時也發揮了民族認同的融和性。本文指出，北戴河的休旅空間的經營及其所承載的地方感之演變，不單反映當地中國人及西方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同時參與塑造城市菁英的民族及階級身分認同。

關鍵詞：北戴河、海浴、朱啟鈐、北戴河海濱公益會、旅遊指南

* 本文初稿於2014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蒙與會者提出寶貴意見。作者並感謝集刊匿名評審人的修訂建議。此研究為Modern Body, Modern State: A History of Swimming in 20th Century China的其中一項研究成果，得到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資助。

收稿日期：2016年9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7年2月17日。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前言

1924 年，時年 27 歲的徐志摩（1897-1931）在文壇漸露頭角，於《文學旬刊》發表〈北戴河海濱的幻想〉。此篇短文中，徐志摩並不著意於細述北戴河的風光，而是要向讀者剖白在北戴河海濱上的思潮起伏。因為左眼發炎，沒有跟隨同伴到海邊逐浪；徐志摩獨自坐在海濱屋前，一邊感受清晨的海風，一邊遠眺「浴淥內點點的小舟與浴客，水禽似的浮著」。北戴河似乎是讓他無所事事暫時逃離現實各種煩惱的空間，海洋則成為他的人生隱喻。他寫道：「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命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清翳」。他最後說，北戴河可以讓他暫時「忘卻我自身的種種」，以及「忘卻我的過去與現在」。¹文人逃離市井的煩囂，以淨化心靈，通過重投大自然以回歸自我，在中國有悠長的歷史，這種文化傾向充分體現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中。而海濱從大自然空間，轉化為中國上流社會以至普羅大眾的消閒活動空間，是值得深入探討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嶄新文化現象。

海濱是客觀存在的地理實體，但人們對海濱的態度，卻是一種集體的文化建構，並且因時地而異。無論是在中國或西方文化中，海洋及海濱最初皆被視為令人惶恐不安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大自然領域。把海濱轉化為閒暇空間，源自西方數世紀以來的文化變遷。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在《海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Sea*）一書中，追溯西方文化從恐懼海洋到擁抱海洋的歷程。他指出，海洋令人聯想到聖經中上帝用以懲罰人類的大洪水，同時也被視為各類不知名的妖怪的居所，是滿布危機的異域。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人們對海洋的恐懼出現變化：海洋學（Oceanography）的發展，增加了人們對海洋的了解和認知，海洋遂變得不如過往般危險和神秘。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興起，亦改變了西方文化對大自然的態度。詩人開始到海邊尋找創作靈感，畫家筆下的海

¹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文學旬刊》，期 39（1924 年 6 月 21 日），頁 1-2。《文學旬刊》為《晨報》的附刊。〈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一文收入徐志摩，《自剖》（上海：新月書店，1928），頁 57-62。

洋，也從波濤汹涌逐漸變得波平如鏡。²第得耶·尤班（Jean-Didier Urbain）在《海灘上》（*At the Beach*）中，分析了海濱文化意涵在西方的轉變。他指出在十九世紀開始出現的海濱渡假風氣與傳統的旅遊文化有明顯差異。停駐在海濱上的「渡假者」（vacationer），並不像不斷進行空間移動、尋幽探秘的「旅客」（tourist）般，以探索大自然或了解異文化為目的。這些來自城市的靜態渡假者（sedentary vacationer）到海濱去，只是為了找尋難得的寧靜環境及單純簡樸的氛圍，並通過旅程進行對自我身分的覓尋與重構。³愛麗絲·迦納（Alice Garner）的《多變的海濱》（*A Shifting Shore*），細緻描繪了法國海濱渡假勝地阿卡雄（Arcachon）從小漁村被改造成為海浴勝地的過程，以及當地漁民如何在此海濱休旅文化中，被「物化」為旅客的海濱想像的一部份。旅客的出現更改變了海濱的人文景觀：當旅客與漁民在使用海濱的權益上出現矛盾時，漁民的活動空間受到愈來愈多限制，最後甚至被趕走。⁴

西方的海浴及海濱休旅文化隨著殖民主義擴張被移植到亞洲，慢慢改變了中國人對海濱的空間概念。傳統中國社會視海濱為荒蕪無用之地，充其量只是作為鹽場或捕魚的經濟場域。到了二十世紀初，一些中國人慢慢接受了海濱的休閒用途，視之為可用作避暑及療養的地方。西方海浴在華人社會所帶動的海濱地理景觀及文化變遷，已逐漸受到學界關注⁵。筆者有關殖民地時期香港著名海浴場淺水灣的研究，從殖民地的空間政治的角度，探討 1920 及 1930 年代香港海濱與海浴文化的發展。指出由於英國「公共衛生」及「閒暇」等概念以及商業利益的考慮，香港政府及資本家在 1910 年代推動海浴文化，共同把位

² Alain Corbin, *The Lure of the Sea: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2-3, 7, 18, 39.

³ Jean-Didier Urbain, *At the Bea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⁴ Alice Garner, *A Shifting Shore: Locals, Outsid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French Fishing Town, 1823-200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⁵ 潘淑華，〈淺水灣：海濱、海浴與香港殖民地的空間政治〉，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頁 115-141。另有關海浴文化在香港的歷史發展，以及所帶動的女性身體觀念及海濱空間的變化，可參看潘淑華、黃永豪，《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

於南岸的淺水灣，營造成上流社會海浴及閒暇勝地。然而社會及種族界線並非固定不變的，在輿論壓力下，淺水灣最終成為不同階級及種族人士共享的消閒空間。馬樹華有關民國時期青島海浴場的研究，分析政府對海浴場的管理及控制，以及海浴如何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份。其認為海浴場體現了政府的市政成就，並為城市贏取聲望，海浴場亦「構築起城市獨特的文化空間」。⁶

以上的研究，展示了推動海濱空間的文化意義變遷之不同力量。海濱空間雖然是遠離現代都市的「荒野」（wilderness），但它被塑造成休閒空間卻是現代化的產物；它是城市居民逃離被現代化發展，弄得污煙瘴氣的都市短暫安身之所。可以說，近現代的海濱有著含混的意義，它既是「現代」的，也是「反現代」的。另外，「渡假者」雖然被海濱樸實的大自然風貌所吸引，但由於他們的終極關注是追尋自我身分及滿足對異域的空間想像，因而不惜改造海濱的大自然以至人文景觀，以滿足自己的預設與想像。西方海濱休閒文化在華人社會的移植，引申出更為複雜的文化及民族差異與交融之問題。香港及青島海浴場的迅速發展，反映了民國時期中國人欣然接受並積極實踐來自西方的海濱與海浴文化，海浴場甚至成為體現「現代性」及政府管治成就的指標。

本文集中探討位於河北省臨榆縣的著名海浴場北戴河，以了解民國時期海濱及海浴在城市菁英及民眾新興的休旅文化中之位置。北戴河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在 1949 年後，北戴河成為中共政權領導人的消暑勝地，也是非正式的政治決策中心。毛澤東（1893-1976）在 1954 年寫成〈浪淘沙·北戴河〉，當中他面對白浪滔天，詠嘆「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似乎視北戴河為中國急遽的政治變化的縮影。⁷事實上，自十九世紀末北戴河被「發現」後，一直鋪展著海濱、休閒與國家政治三者相互糾纏的複雜關係。在民國時期，如徐志摩等城市菁英分子到北戴河海濱渡假，這既是對自我身分

⁶ 馬樹華，〈海水浴場與民國時期青島的城市生活〉，《史學月刊》，2011 年第 5 期，頁 99。

⁷ 〈浪淘沙·北戴河〉的全文為「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毛澤東，《毛澤東詩詞十八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頁 38。

的反思和尋覓，也是階級身分的呈現，更是體驗及體現「摩登」文化的途徑。而北戴河作為由西方人開發及管理的閒暇空間，同時又被視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縮影，勾起中國人的無力感與無能感。因而要了解北戴河多層的、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矛盾的含義，以及北戴河作為休旅空間所帶動的社會及文化變遷，我們必須追溯其建構過程及在不同媒介中如何被再呈現。就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強調要理解空間如何塑造人們的文化與活動，必須先弄清楚空間的建構過程及當中的權力關係。他認為空間並非自然生成的理所當然的存在（absolute space），空間既是由社會關係塑造而成的產物，同時也成為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一項重要元素。⁸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Yi-fu Tuan）亦強調，由於人們的參與及塑造，空間的意義不斷在轉化。他把「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區別開來，有別於「空間」的開闊與廣袤無邊，「地方」擁有較具體的地域及文化身分。人在「空間」移動，在「地方」停駐；「空間」代表自由，「地方」則給予安全感。因而我們必須關注「空間」如何轉化成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地方」，並被賦予獨特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這與人們對地方的理解及體驗又如何相互影響。⁹地方感對身分認同的形成因而有密切關係，人們在閒暇空間所塑造及體驗的地方感，幫助他們重新發現或加強自我身分認同。¹⁰

有關民國時期北戴河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關注點主要有二：一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論述管治北戴河的困難及成效；¹¹二是考察民國時期的畫報對北

⁸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111.

⁹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3-7.

¹⁰ Sean Gammon and Sam Elkington, eds., *Landscapes of Leisure: Space, Place and Ident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2;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p. 39.

¹¹ 如趙欣，〈1934年－1948年北戴河外籍人員管理研究〉（保定：河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0）；呂曉玲，〈近代避暑地華人自治管理探析——以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為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37期5（2011年9月），頁70-75。

戴河海浴文化的再呈現。¹²本文則強調北戴河的休旅空間的經營及其所承載的地方感的演變，這些變化又如何反映及重塑當地中國人及西方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中國城市菁英的民族及階級身分認同。文章首先分析清末鐵路發展如何令北戴河進入在華西方人的視野。在西方人的經營下，北戴河從無人知曉的地理「空間」，被經營成為擁有獨特性格、名聞中外的「地方」，中國城市菁英因而對海濱的用途和價值有全新的認知。文章的第二部份分析北戴河在進入華人城市菁英的視野後，其景觀及所代表的休旅文化的轉變。1910 年代，以朱啓鈴（1871-1964）為首的中國城市菁英組成「北戴河海濱公益會」，憑藉與北洋政府的密切關係，確立中國人在北戴河海濱的控制權，並在其控制的聯峰山（又稱蓮蓬山、西山）建構富中國傳統特色的人文景觀及休閒文化，北戴河因而被賦予一層新的意義及地方感。

第三部份通過多本北戴河旅遊指南，再輔以多篇不同時期出版的北戴河遊記，分析北戴河休旅空間的再現，以及印刷媒體對北戴河休旅空間的再現與塑造。這些旅遊指南包括由京奉鐵路管理局於清末開始編製的《京奉鐵路旅行指南》、徐珂（1869-1928）撰寫並於 1921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北戴河指南》、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幹事管洛聲（1867-1938）於 1925 年寫成的《北戴河海濱志略》，以及北寧鐵路管理局與中國旅行社於 1935 年出版的《北戴河海濱導遊》，¹³結論部份以北戴河個案引申出「城鄉對立」論述的局限性，以及遠離城市現代文明的海濱對城市人想像與體驗「摩登」的重要性。

¹² Yunxiang Gao, "Beidaihe Beach, Leisure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 Commerce, Media, Politics* 15:10 (Dec. 2012), pp. 1353-1380.

¹³ 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幹事管洛聲於 1925 年寫成《北戴河海濱志略》，介紹北戴河的歷史及公益會管理區域的各處名勝古蹟。此著作並非由書局出版及售賣，其撰寫目的旨在陳述公益會對開發北戴河聯峰山的貢獻，但由於當中包括旅遊資訊，如火車時間表及收費等，因而亦發揮了旅遊指南的功能。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河北：北戴河海濱公益會，1925）。管洛聲為江蘇武進人，清末曾任奉天新民府知府及奉天勸業道。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近代人物錄》（天津：天津市地方史志編修委員會總編輯室，1987），頁 368。北寧鐵路管理局、中國旅行社編印，《北戴河海濱導遊》（上海：中國旅行社，1935）收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王強、張元明主編，《民國旅遊指南彙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冊 39。

二、交通網絡與北戴河海濱的「發現」及開關

究竟是誰首先「發現」北戴河？「發現」似乎是一個很容易引起爭議的詞彙。在還未成為海濱度假勝地之前，現被稱為北戴河的海濱區域已存在於清朝的管治版圖中，隸屬河北省臨榆縣，位於戴家河的出海口，鄰近山海關及秦皇島。根據光緒四年（1878）的《臨榆縣志》，北戴河海濱附近有不少村落，如劉家莊、草廠莊、丁家莊、單家莊等（附圖 1）。雖然瀕海地區人煙稀少，但村民對鄰近的海濱絕不會陌生；因而從中國的角度，並不存在誰「發現」北戴河的問題。但不能否認，北戴河作為休旅空間的潛質在西方人「發現」後，才得以轉化為海內外知名的海濱度假勝地。1899 年 7 月，《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刊登一篇名為〈中國的療養地：北戴河〉（*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的文章，來自英國當時居於天津的作者馬萊緒（William Mcleish，或譯麥萊緒、麥賴斯）對北戴河推崇備至，認為其美麗如畫的景色絕不遜色於歐洲的著名海濱。文章中提出誰發現北戴河的問題，但認為由於不少人爭著追認自己是北戴河的發現者，所以最好還是避免提出這個容易引起紛爭的問題。不過他指出，鐵路的興建及參與其中的西方工程師，是令北戴河被「發現」的主要原因。¹⁴

海濱度假勝地一般位於遠離城市的邊陲地帶，由於地理上的邊緣性，才使其得以成為城市人逃離繁囂的短暫避難所。但另一方面，海濱度假勝地的發展和經營，有賴現代交通網絡將海濱與城市連繫起來，使大規模之人的流動成為可能。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及歐洲，鐵路網絡是海濱度假勝地發展的關鍵，在中

¹⁴ William Mcleish, *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 (Shanghai: Publisher Unknown, 1899). 原來文章分成 3 部份，1899 年 7 月 17 日、24 日及 31 日刊載於《北華捷報》，同年於上海出版成 13 頁的小冊子，出版機構不詳。

國亦有類似的發展。¹⁵北戴河能夠被營造成為華北最重要的海濱閒暇勝地，契機是清末京奉鐵路（1928 年後稱為北寧鐵路，又稱寧瀋鐵路）的興建，使偏遠的北戴河進入西方人及中國人的視野。興建京奉鐵路的最初目的是發展經濟而非休旅文化。為了開發煤礦，清朝於 1881 年開始於河北唐山興建以運煤為主的唐胥鐵路（連結唐山與胥各莊）。其後由於軍事需要，清朝於 1890 年在山海關駐兵，因而決定延伸鐵路（即津榆鐵路，於 1894 年落成。津為天津，榆為榆關，即山海關）。其後鐵路陸續向東北延伸至奉天（瀋陽），向西延伸至北京；1907 年此鐵路被命名為京奉鐵路，全長 844 公里。京奉鐵路上有北戴河站，北戴河因而得以與北京及天津等大城市連繫起來。從天津到北戴河車站只需 6 小時。¹⁶不過由於京奉鐵路的北戴河站與海濱相距頗遠，民國初年，在經常到北戴河度假的上流人士（當中包括外國使節）要求下，鐵路局決定建北戴河支線，以連接北戴河站及北戴河海濱（新建的車站名為北戴河海濱站）。並於 1914 年動工興建，1917 年築成通車，全長約 10 公里。¹⁷

在此必須說明，在清末民國時期，「北戴河」並沒有明確的地理界線，而是泛指戴家河以東的海濱區域。根據《中國的療養地：北戴河》，北戴河之名源自當地的「北戴河村」，此村落並非瀕臨海濱，但由於京奉鐵路在此區域興建的車站鄰近北戴河村，因而名為「北戴河站」。¹⁸結果，北戴河從一個村落

¹⁵ John K. Walton, *The English Seaside Resort: A Social History, 1750-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日本，鐵路公司亦積極開闢鐵路沿線的海濱成為海水浴場。見〔日〕畔柳昭雄，《海水浴と日本人》（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頁 27-30。

¹⁶ 凌鴻勳編著，《中華鐵路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頁 84-88。根據此研究，京奉鐵路在客運及貨運方面皆有良好發展，貨運以煤及糧食為主。1928 年，北京改稱為北平，奉天亦改稱為遼寧，京奉鐵路因而易名為北寧鐵路。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編委會，《北京交通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 125。

¹⁷ 京奉鐵路管理局總務處編查課編，《京奉鐵路旅行指南》（天津：京奉鐵路管理局，1917），頁 57；張雨才編，《中國鐵道建設史略 1876-1949》（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頁 20；*Peitaiho Directory 1924*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4).

¹⁸ 見 William Mcleish, *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 p. 2. 馬萊緒因而認為把當地的海濱區域稱為北戴河其實是「誤稱」（misnomer）。然而《（光緒）臨榆縣志》只提到「戴家河」，並沒有「北戴河」。根據其記載，戴家河、楊各莊、牛蹄窠、周家營、北楊各莊、撥道窪、長不老口、高家嶺、小營、鄭家店、倉上莊，「以上十一村，戴家河地方經管」。見〔清〕趙允祐重修，高錫疇纂，《（光緒）臨榆縣志》（出版資訊不詳），卷 7，〈輿地編·里市〉，頁 22。可見

的名稱，演變為泛指當地的海濱區域。鐵路不單把北戴河與天津和北京連結起來，也令北戴河的海濱通過命名，從沒有名稱的地理「空間」，變為有獨立名字及被賦予獨特「地方感」的「地方」。

但為何清政府在京奉鐵路上建立北戴河站呢？這很可能是參與鐵路工程的西方工程師的影響。在此鐵路計畫中被委任為總工程師的英國人金達（Claude W. Kinder, 1852-1936），因勘察鐵路地點而發現了偏遠的北戴河，一些英美教會人士亦相繼到該地遊覽，北戴河因而進入在華西方人的視野。在夏天，北戴河的平均氣溫約攝氏 25-28 度，比北京及天津動輒 33 度或以上的氣溫涼快得多。西方人發現北戴河的美景及怡人的天氣後，把該處開闢成為他們的避暑及海浴勝地。1893 年由於興建山海關的一段鐵路，西方工程師吐納耳（F. B. Turner）遂居於北戴河。鐵路於 1894 年完成後，往來北戴河較以前方便，到北戴河建屋作為避暑居所的西方人愈來愈多。《北華捷報》指出北戴河為住在悶熱的天津之西方人提供了避暑海濱勝地，他們為同一目的湧至北戴河，就是在海邊找尋合適的位置建房子。¹⁹中國人亦開始了解北戴河發生的變化，1898 年上海《申報》報導：「津榆鐵路自通山海關後，西人絡繹趨北帶河〔按：即北戴河〕購地建屋，以為消暑之區，蓋其地抱水環山，夏時涼颼颼然，不似津城之熱惱」。²⁰當地村民對於西方人願意以可觀的價錢，向他們購買並不肥沃的土地，最初心存疑慮。外國人不但購地建屋，並且在岸邊各自搭建鉛皮小屋，作為海浴時用的更衣室。²¹

戴家河既是河流的名字，也是村落的名字。但在 1929 年重修的《（民國）臨榆縣志》，戴家河變為「北戴河堡」，共有 9 條村（包括北戴河莊、撥道窪、南楊各莊、周家營、長不老口、高家嶺、小營、北楊各莊及鄭家店）。見高凌霄、仵墉修、程敏侯等纂，《（民國）臨榆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高錫疇等纂高凌霄等重修民國 18 年（1929）鉛印本影印，1968〕，卷 6，〈輿地編·里市〉，頁 16。

¹⁹ “Outports, & C.—Tientsin: A Seaside Resort,” *North China Herald*, LII: 1399 (25 May, 1894), p. 800.

²⁰ 〈擬開口岸〉，《申報》，1898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²¹ William Mcleish, *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 p. 2.

1898 年是北戴河發展的轉捩點。由於根據清廷規定，只有教會得到允許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購買土地，因而其他外國人也只能通過教會在北戴河購買土地建屋。²²1898 年 3 月，總理衙門奏請開闢位於北戴河以北的秦皇島為通商口岸，奏摺指「北戴河至海濱之秦王島隆冬不封，每年津河凍後開平局船由此運煤，郵政包封亦附此出入，與津榆鐵路甚近……殊於商務有益」。²³同年 4 月，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呈請「由秦王島至戴沽河〔按：即北戴河〕洋人建屋處沿海岸往內三里地方及往東北至秦王島對面地方均劃歸通商地界」。被清廷委託對此探究可行性的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對此表示支持，認為清政府「自開商埠」可保自主權，此有異於「約開之通商口岸」。²⁴清廷遂把秦王島至北戴河沿海劃為自開口岸，並訂立土地政策，「凡自開口岸，其地畝願賣與否，均聽民間自便，外人不得強勉」。²⁵土地得以自由買賣後，到北戴河避暑及建屋的西方人更多。

1896 年西方人興建的房屋有二十多間，1899 年已增加至近百間，人數約有 400 人，房屋的價值亦暴漲。²⁶這些西方居民意識到需要成立自身的組織，以有效管理此海濱避暑地。1906 年，《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主編撰文認為在北戴河置有產業的西方人，應聯合制定管理規條及衛生章程，並向中國政府申請在當地建立民政廳；²⁷此提議並沒有落實。但亦有西方人心

²² 根據狄德滿（R. G. Tiedemann）的研究，清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容許天主教傳教士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購買土地。基督新教傳教士認為他們有相同的權利，地方官員為息事寧人，容許所有外國傳教士購買土地。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pp. 310-311.

²³ 〈奏開岳州三都澳秦王島三處口岸摺〉，〔清〕蔡及煌編，《約章分類輯要》（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冊 4，卷 18 下〈口岸商務門關·章類〉，頁 17-18。

²⁴ 〈總稅司赫議開三口申呈〉，〔清〕蔡及煌編，《約章分類輯要》，卷 18 下〈口岸商務門關·章類〉，頁 19。

²⁵ 〈照會美國領事官文——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十四日〉，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魏子初編，《帝國主義與開灤煤礦》（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頁 210。

²⁶ William Mcleish, *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 D. Warren Smith,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the Far East*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900), p. 81.《北華捷報》在 1898 年報導，一幢 4 個房間的別墅，1896 到 1897 年的價錢是 1,500 到 2,500 兩，1898 年已增加至 4,000 兩。
“Outports, ETC: Tientsin,” *North China Herald*, LX: 1600 (4 April, 1898), p. 572.

²⁷ 〈西報紀西人擬在北戴河設立民政廳〉，《申報》，1906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存懷疑，認為作為「自開商埠」的秦王島及北戴河，並不能成立如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般的行政管理機構。但這無礙在北戴河不同區域居住的西方人分別成立團體，管理北戴河各個海灣（附圖 2）。除了早於 1894 年由英國衛理公會（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成立的「石嶺會」（Rocky Point Association）外，1910 年代在北戴河相繼出現了「東山會」（East Cliff Association）、廟灣會（Temple Bay Association）及「燈塔會」（Lighthouse Point Association）等西方人團體。²⁸

由於鐵路交通逐步改善，不單僑居於北戴河的西方人日多，以致「海濱之土，幾無隙地」，不少中國人亦慕名而至。²⁹政府高層官員及熟識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享有社交網路及經濟資源條件，得以較早知悉及實踐這種新的海濱避暑文化概念。其後，報章、旅遊指南及遊記等出版物成為重要的推廣媒介。例如在 1900 年代先後出任天津海關道及順天巡撫的唐紹儀（1862-1938），因患肺病，於 1909 年到北戴河養病，報章指他「自易地養病後，甚有功效，近日回津，其病已大愈矣」。³⁰過往官員回鄉養病的傳統已出現變化，把海濱視為療養地的西方觀念慢慢為中國政客接受及模仿。女作家呂碧城（1883-1943）是另一位早年到北戴河的少數中國旅客之一。³¹1910 年，她到北戴河養病，並探望在當地聯峰山頂建有別墅的英國友人甘德璘（Candlin，亦譯作甘林）女士，之後在《婦女時報》發表〈北戴河遊記〉一文。³²她在文章中描述了西方

²⁸ *Peitaiho Directory 1918* (Tientsin: Rocky Point Association, 1918), p. 20; *Peitaiho Directory 1924*, p. 3. 林伯鑄，〈北戴河海濱風景區志略〉（北戴河：北戴河海濱風景區管理局，1938），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冊 4，頁 20-21。

²⁹ 徐珂，〈北戴河指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頁 7。

³⁰ 《申報》，1909 年 10 月 18 日，第 6 版。

³¹ 呂碧城是山西學政呂鳳岐（1837-1895）的女兒，在清末時期發表文章積極提倡女學。她後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文學，熟悉西方文化，亦有不少西方友人。有關呂碧城的研究，可參考范純武，〈清末民初女詞人呂碧城與國際蔬食運動〉，《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105-113；賴淑卿，〈呂碧城對西方保護動物運動的傳介——以《歐美之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期 23（2010 年 3 月），頁 79-118；黃嫣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收入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集 5，頁 238-256。

³² 甘德璘女士，其父佐治·甘林（George Thomas Candlin, 1853-1924）為英國聖道會（Methodist New Connexion）傳教士，1870 年代到中國傳教，於 1896 年在聯峰山頂築成別墅。他於 1924 年 7

人在當地的海浴盛況，把海浴中的女性形容為「簇擁芙蓉，彷彿浴神化身千百，作水國之嬉遊也」，她對此為之「目眩神移」。文章末段總結此行的感受：「吾國人當炎夏之際，襍汗喘於市井之間，國有勝境，不知闢而游之，乃為他人捷足先登，反賓為主」。³³呂碧城在此把民族情感注入海濱的休閒空間，表達了洋人在中國土地上「反賓為主」的慨嘆，文章同時反映出兩種觀念的變化：（一）認為中國人應如西方人一樣，在炎夏時需要離開城市／「市井」避暑；（二）海濱是避暑的「勝境」。炎炎夏日不單是對季節的客觀描述，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感知方式，炎夏是一直存在的，中國過去亦存在不同的「消暑」或「消夏」方式，但城市的炎夏變得難以忍受，而要到海濱避暑的心理需求，則是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西方的海濱避暑文化，逐漸模塑了中國人對暑熱的身體經驗的敏感度及反應，可見身體或感官的覺知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³⁴

三、休旅文化與空間政治：北戴河海濱公益會

呂碧城於 1910 年慨嘆北戴河這勝境被外國人捷足先登占有。1918 年由朱啓鈴為首的一群中國商人、政客，組成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在其 1925 年出版的《北戴河海濱志略》中，把公益會的成立，解釋為中國人奪回北戴河主權之義舉，指摘「石嶺會駸駸行政之權，乃行政官放棄不問耳」，以至「石嶺會組織，最早幾有喧賓奪主之勢」，「今以公益會團體之力，斤斤爭主權」。書中進而指由於「公益會成立急起直追，以經畫市政保存主權，雖財力限之，未能多所興舉，而地方頓改舊觀」。³⁵今天，北戴河的一個海灘上豎立著一座朱啓

月 11 日在北戴河去世，葬於北戴河西方人墓地。“Deaths,” *North China Herald*, CLII: 2971 (19 July, 1924), p. 120.

³³ [呂]碧城，〈北戴河遊記〉，《婦女時報》，期 1（1911 年 4 月），頁 36。

³⁴ 例如白居易、陸游及袁枚等詩人皆有有關「消夏」的詩作。有關具文化特色的身體經驗，可參看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 9-10。

³⁵ 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16、23。

鈴的銅像（附圖 3），基石上的解說延續著公益會重奪北戴河主權的民族主義論述。³⁶海濱是休旅的空間，但海濱空間的控制與管理，卻被賦予了民族意義，休旅空間因而也成為了塑造民族認同的場域。令人費解的是，石嶺會早於 1894 年成立，為何朱啓鈴在 1918 年才採取行動抗衡石嶺會？究竟朱啓鈴憑藉甚麼政治及文化資源，通過成立「北戴河海濱公益會」（下稱「公益會」）以「斤斤爭主權」？朱啓鈴所代表的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群體？此群體以甚麼理念經營北戴河？他們所管治的海濱，與西方團體所管治的地域有何差異？這種差異是什麼因素造成？又蘊含了什麼文化意義？

朱啓鈴是公益會的關鍵人物，自 1918 年至 1927 年間任會長一職。他在民國初年為北洋政府要員，曾任交通總長，是「交通系」重要人物之一。³⁷「交通系」與袁世凱（1859-1916）關係密切，朱啓鈴亦是袁世凱的支持者，更出任袁世凱稱帝大典籌備處的處長。袁氏稱帝失敗並於 1916 年病死後，朱啓鈴被通緝，仕途似乎已走到盡頭，因而視北戴河為歸隱之所。這解釋了為何朱啓鈴在翌年於北戴河海濱購地置屋，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其在 1917 年「經營山東嶧縣中興煤礦公司，自食其力，又與室人偕游北戴河海濱，買山築室作終焉之計」。³⁸結果他在聯峰山建成「蠡天小築」，其後甚至把逝世的家庭成員也安葬在北戴河住所旁，墳地名為「朱家墳」。³⁹

³⁶ 銅像的基石上刻朱啓鈴的生平及嘉許他重奪中國人在北戴河「行政主權」的文字，指他「在海濱購地置屋。1918 年，面對外國教會組織石嶺會『駁駁侵行政主權』，乃以『拒外人，爭主權』為宗旨，成立地方自治團體北戴河海濱公益會，任會長」。銅像豎立的確實年分不詳，估計應在 1980 年代以後。

³⁷ 「交通系」是自晚清以來因政府興辦鐵路而發展出來的利益集團及政治派系，領袖為梁士詒及葉恭綽，成員有朱啓鈴、周自齊、鄭洪年、施肇曾等。他們為主管鐵路、航運及交通銀行等範疇的政府官員。朱啓鈴曾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及津浦路北段總辦。交通系在國民政府成立後失去了政治影響力。見張瑞德，《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152-154、226-235。

³⁸ 朱啓鈴，〈朱啓鈴自撰年譜〉，收入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共河北省秦皇島市委統戰部編（下略），《蠡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頁 5。

³⁹ 葬於朱家墳的包括朱啓鈴的妻子于寶山（1927 年去世）、七女兒朱浦筠（1930 年去世）、長子朱沛（1963 年去世）及妻子孟廣慧（1939 年去世）夫婦。朱啓鈴生前曾表示希望死後下葬北戴

事實上，退隱北戴河的朱啓鈴與北洋政府的關係仍然非常緊密，他自清末開始與徐世昌（1855-1939）關係密切，1918 年成為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的徐世昌，於 1919 年委任朱啓鈴出任北方總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南北議和會議。⁴⁰朱啓鈴與北洋政府的政治聯繫，亦使北戴河成為重要的非正式政治空間。早於 1918 年，北洋政府不同派系間的議和活動已在北戴河舉行。1918 年 8 月，上海《申報》的一篇雜評，指出了北戴河由歸隱場所轉變為政治中心的微妙政治角色：

北戴河為向來避暑之佳地，亦即為欲避政潮者之歸隱所也。然而今日之北戴河則已一變而當政潮之衝，官僚政客麇集河上，所謂京津方面和議之活動，以北戴河為中心者。⁴¹

可見，北戴河雖然在地理上遠離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卻是重要的政治場域，是當時非正式的政治談判場所。

在 1918 年《申報》指出北戴河的政治重要性之時，朱啓鈴正著手成立公益會，積極發展改造北戴河的大計。暫時沒有足夠資料讓我們更進一步分析兩者的關係，以及朱啓鈴成立公益會以發展北戴河，是否其政治計畫的一部份。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朱啓鈴成立公益會後，到北戴河建屋避暑的名流政客愈來愈多。朱啓鈴剛到北戴河時，在聯峰山南麓一帶建有別墅的，只有「交通系」領袖梁士詒（1869-1933）。朱啓鈴積極吸引其他名人到北戴河建屋，聯峰山一帶出現的別墅愈來愈多。其女兒朱洛筠回憶說，「先父這種做法無非是設法引起他們對海濱的興趣，並來此建築別墅，然後好捐資開發」。⁴²1919 年，公益會擬定章程並正式成立時，上呈內務部的文件共有 15 人簽署，當中除「交通系」的朱啓鈴、梁士詒、施肇曾（1867-1945）及周自齊（1871-1923）外，

河，1964 年去世後，被政府安排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楊炳田，〈朱家墳始末〉，收入《螻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138-139。

⁴⁰ 崔勇，〈朱啓鈴小傳〉，收入朱啓鈴著，崔勇、楊永生編選，《營造論——暨朱啓鈴紀念文選》（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頁 258-259。

⁴¹ 默，〈雜評一：北戴河〉，《申報》，1918 年 8 月 19 日，第 2 張第 7 版。

⁴² 朱洛筠，〈朱啓鈴與北戴河〉，收入《螻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89-90。

也有其他軍政商界重要人物，如段芝貴（1869-1925）、周學熙（1866-1947）及曹汝霖（1877-1966）等。⁴³朱啓鈴的推動及公益會的成立，促使北戴河成為中國政商名流的重要休閒避暑空間，並繼續作為非正式的政治談判場所。

公益會著手發展北戴河的休旅空間，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公益會擁有北戴河聯峰山南麓的一大片土地，聯峰山前是理想的海濱（後被開闢成 3 個海浴場）。前文提到，過去中國社會對海濱抱持漠視的態度，令呂碧城慨嘆中國人「國有勝境，不知闢而遊之」。西方人既已紛紛在北戴河買地建屋，朱啓鈴如何獲取土地以構築其理想的休旅空間？首先，他所發展的聯峰山南麓本是德國軍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間接讓朱啓鈴得到發展北戴河的機遇。德國在 1900 年的義和團事件中，通過參與八國聯軍介入中國事務，並在北戴河一帶建立軍營。1906 年清廷接收德軍的北戴河軍營，但根據協定，德國仍可向中國借用軍營作避暑用途。德國政府隨即在 1907 年為其駐北京使領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別墅，可見並不願意放棄北戴河的使用權。⁴⁴直至 1914 年 8 月，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能鑑於因戰事無暇兼顧軍營，駐華德國使領把軍營交還中國。後中國於 1917 年向德國宣戰，德國戰敗最終未能取回北戴河軍營。朱啓鈴憑藉他與北洋政府的關係，加以利用此難得的時機，以發展地方公益的名義，向河北省政府借用面積共約 147 畝的德國軍營。⁴⁵

⁴³ 劉宗漢，〈朱啓鈴與公益會開發北戴河海濱拾補〉，收入《蠅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125。

⁴⁴ 〈紀事：借用舊德兵營原始〉，見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編，《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報告書》（河北：北戴河海濱公益會，1921），頁 17-18；〈德國籌款建造駐華領事署〉，《申報》，1907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義和團事件後，清政府要求出兵的國家撤兵。德國獲清朝允許在山東膠濟鐵路興建支線等權益後，陸續交還占領地域。1906 年德國減少在直隸省的駐兵，並撤出廊坊、楊村、北戴河、秦王島、山海關等地。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24，本紀 24，〈德宗本紀 2〉，冊 4，頁 955；卷 157，志 132，〈邦交 5·德意志〉，冊 16，頁 4605-4607。

⁴⁵ 在一次大戰後，公益會與德國使館在北戴河土地擁有權上曾發生糾紛。德國方面指公益會借用的德國軍營，有部份土地是德國使館在戰前向一張姓中國人（應為清官員張翼，見下文）購買的產業。雙方最終在 1922 年 8 月 31 日達成協議，公益會得以保留土地。見〈北戴河德使館地糾葛案現經德使前往商同公益會議定和解辦法據情轉陳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3-16-019-03-010。

此外，在 1919 年朱啓鈴上書內務部成立公益會的同時，成功要求內務部禁止西方人在其打算發展的範圍內進行土地買賣。他期望政府「遇有外人欲租聯峰山及鴿子窩範圍以內之地，其契一律不准投稅，以杜紛爭而保存地方名勝古蹟」。⁴⁶由於他與北洋政府關係密切，呈請很快得到批准。公益會此舉可說是以「公益」及「保存地方名勝」的話語，把原來屬於當地人擁有的土地，不費分毫納入公益會的控制及發展範圍。

其後，公益會又從在北戴河擁有大片土地的張叔誠（1898-1995）手上得到聯峰山的部份土地。張叔誠並非北戴河村民，他的父親張翼（即張燕謀，1846-1913）在清末曾出任工部右侍郎及總辦路礦大臣。張翼以張積善堂的名義，於 1897 年購買北戴河聯峰山上聯峰寺（即觀音寺）的公產。⁴⁷根據公益會幹事管洛聲的《北戴河海濱志略》中解釋，聯峰寺及其寺產原為當地名為「十三牌」（「牌」又寫作「排」）的村落聯盟共同擁有。⁴⁸並非所有「十三牌」村落成員皆同意這次土地交易，引致其後「十三牌爭訟不已」。張翼在 1913

⁴⁶ 〈國內要聞：朱啓鈴經營北戴河計劃〉，《申報》，1919 年 10 月 16 日，第 2 張第 6 版。

⁴⁷ 有一說法是張翼買了聯峰山一帶共四座山的土地，原因是清廷要「防止外國人在海濱繼續侵山佔地」。見楊炳田，〈朱啓鈴與公益會開發北戴河海濱〉，收入《螻蛄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104。然而根據張翼在 1899 年的奏摺，買地應該是他的個人決定而非執行清廷的命令。奏摺指出：「臣一面密派幹員將該處〔按：秦皇島〕一帶地畝並接連沿海之金山咀、北戴河，無論平地荒基，籌資購買，十得七八。適奉諭旨，作為通商口岸，各國購地者紛紛而來，幸臣已占先」。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編印，《清代外債史資料（1853-1911）》（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88），上冊，頁 640。《北華捷報》在 1898 年的報導，則指張積善堂即使不是與外國人合作，也是在外國人的建議下大舉買地。原文是：“The only big question broached was the illegal appropriation of foreshore by native land-grabbers.....the greatest offender is a wealthy Chinese Syndicate, supposed to be acting under foreign advice if not with foreign partnership. This Syndicate, the Chi Shang Tang, hopes to see the NEW TREATY PORT OF CHINGWANG [原文大寫] established at Peitaiho and is acting accordingly.” in “Outports, ETC: Tientsin” *North China Herald*, LX: 1607 (23 May, 1898), p. 884. 至於張翼是否藉此囤積土地以牟利，並非本文探討的範圍。

⁴⁸ 「十三牌」的村落成員包括：劉莊、赤土山、大小薄荷寨、崔各莊（以上各為二牌），草廠、小辛莊、王胡莊、六合（以上各為一牌），費莊、喬各莊（合為一牌）。《北戴河海濱志略》指「舊有碑記載清乾隆六十年十三牌重修聯峰山上的觀音寺，但「碑文簡略而又殘缺不能詳其原始」。見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69。由於觀音寺石碑已不存，「十三牌」之組織亦不見於《臨榆縣志》，因而難以進一步了解「十三牌」的歷史及功能。北戴河另有名為「八牌」、共同擁有如來寺的村落聯盟。見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75。「牌」看來有「股」的意味，不同村落占有公產中不同數目的股份。

年因病去世後，張積善堂在北戴河的土地，由其子張叔誠繼承。張叔誠願意把聯峰山的土地捐給朱啓鈴的公益會，相信與兩人在中興煤礦的關係有關。1899年張翼在山東嶧縣（今棗莊市嶧城區）籌辦中興煤礦公司，其去世後，發展一直不順利的中興煤礦公司改組，北洋政府重要人物徐世昌成為董事會長。上文提到，徐與朱啓鈴關係友好，因而推薦朱啓鈴出任董事，更讓朱代其履行董事會長的職務；當時仍然年幼的張叔誠則出任監察人一職。⁴⁹朱啓鈴因而可說是張叔誠的長輩及中興煤礦的合作伙伴，兩人關係密切。公益會成立後，張叔誠不單捐獻 1,000 元給公益會作經費，更在朱啓鈴的倡議下，把張積善堂名下在聯峰山的土地捐出，建成蓮花石公園。把「爭訟不已」的土地捐作「公益」用途，轉化成為向公眾開放的閒暇空間，或許是中止爭議的有效解決方法。連同原來的德國軍營，公益會得以不用花費分毫而把聯峰山的土地納入管理範圍。可見，公益會獲取土地資源的過程並不涉及向北戴河的外國力量「爭主權」，當中成功的關鍵是與北洋政府的密切政治聯繫。⁵⁰公益會在北戴河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導致當地西方人不滿。1924 年，《北華捷報》報導公益會自視為北戴河的合法行政機關，隨意制訂規則，例如禁止任何人取用沙灘上的沙石；當地人蓋房子，需要向公益會繳納每個房間 10 元的費用。廟灣會因而向天津的外國領事投訴，希望當地政府保護北戴河公眾的權利。⁵¹

公益會的影響力，亦反映在北戴河景觀及地方感的變化。公益會進行一系列的空間改造工程，包括修橋築路、建醫院和學校、植樹造林、在海濱開闢海浴場，重修聯峰山上的觀音廟及興建蓮花石公園等。⁵²公益會的工程對北戴河原有的景觀及空間帶來意義深遠的變化。首先，公益會接受了西方的海浴文化，在海濱開闢海浴場，指海浴有益於健康（見下文），但同時亦銳意為北戴河西

⁴⁹ 張叔誠、談在唐，〈中興公司經營始末〉；朱啓鈴，〈中興公司創辦紀實〉，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棗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興風雨》，收入《棗莊文史資料》（棗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棗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輯 19，頁 10、25。

⁵⁰ 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80-82。

⁵¹ “The Blackmail at Peitaiho,” *North China Herald*, CLII: 2971 (19 July, 1924), p.87.

⁵² 北寧鐵路管理局、中國旅行社編印，〈北戴河海濱導遊〉，頁 19。

式別墅建築為主所構成的海濱景觀加入了中國元素。觀音廟及蓮花石公園帶有強烈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蓮花石公園內有形似蓮花的大石，公益會在公園內廣植松樹，並建一草堂，名「松濤草堂」；遊人可在公園內欣賞奇石及靜聽松濤，這些都是過去中國文人雅士喜好的活動。其次，公益會亦為其工作賦予濃厚的民族自強及與帝國主義抗爭之意味。例如在 1933 年公益會的一次會議中，一位會員說：「本會於民國 7 年中國加入歐戰後成立，並非為個人娛樂起見，完全是為爭國際地位，不忍坐視地方事業經營之權落諸外人之手」。⁵³但事實上，「爭國際地位」的民族主義論述，並不見於公益會早期的文件，例如上文提到於 1919 年公益會成立時給內務部的呈文，並沒有提到任何對北戴河「主權」的關注，其所憑藉的理據，是保存山川名勝及興辦公共事業的政治意義，指「山川草木之菁英，實為國民高尚之精神所寄」，至於「公共事業之興舉與否，尤為居民自治能力的表示」。⁵⁴可見空間的意義，是隨著不同時代興起的政治論述而不斷被建構的。這亦反映了對公益會來說，純粹作為「個人娛樂」的閒暇休旅並不足以令北戴河的空間及他們對北戴河的經營變得有意義，而必須輔以更高尚宏大的理據。公益會在早期利用培養「國民高尚之精神」及展示「居民自治能力」等論述，以支持開闢海濱為休旅空間的發展計畫。但當民族主義在中國日益高漲時，發展及管理北戴河亦被賦予了「爭國際地位」的意義。休旅的空間，同時也成為體現及加強民族認同的空間。

四、想像北戴河；旅遊指南中的海濱與海浴

1910 年代，北戴河海濱站落成及公益會成立，縮短了北戴河與中國社會在地理及文化上的距離。1920 年代，北戴河在中國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海濱旅遊勝地。雖然能夠到北戴河旅遊避暑的主要是上流人士，但隨著有關北戴河

⁵³ 〈公益會董事會會議紀錄〉，引自楊炳田，〈朱啓鈴與公益會開發北戴河海濱〉，收入《蠓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113。

⁵⁴ 引自劉宗漢，〈朱啓鈴與公益會開發北戴河海濱拾補〉，收入《蠓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頁 124。

的出版物（包括旅遊指南及報章雜誌上的遊記）愈來愈多，即使民眾未能親身到北戴河遊覽，也能通過這些旅遊出版物想像北戴河的景觀和意義。中國人的旅遊地圖及空間概念地圖已被重繪，地圖上的「北戴河」變得愈來愈耀目。不能忽略的是，為旅客提供遊覽資訊的出版物並非在民國時期才出現。過去以商旅為對象的「商人書」，為出門經商的旅者提供各種路程的資訊，當中亦包括各地旅遊名勝的介紹，例如明朝的《新刻士商要覽》及《天下水陸路程》。同時期也有名為「便覽」的旅遊手冊出現，如《西湖志摘粹補遺奚囊便覽》。⁵⁵ 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民國時期的旅遊指南所代表的旅遊文化，其內容及目的與帝國時期的路程書及便覽之類的出版物，主要差別在那裡？

推廣北戴河的英文及中文旅遊刊物自清末已出現。上文提到於 1899 年刊行的《中國的療養地：北戴河》，是有關北戴河的英文旅遊資料的好例子。而最早有關北戴河的中文旅遊資料，相信是京奉鐵路管理局於 1910 年開始編製的《京奉鐵路旅行指南》（下稱《京奉路指南》）。此指南每半年出版一期，為旅客介紹京奉鐵路的基本資料及各鐵路站的名勝古蹟、物產、貨幣、交通、學校、旅館、銀行等資料。《京奉路指南》與過往的旅遊手冊有何不同？是否反映了新式旅行文化的出現？鐵路無疑是新穎便捷的交通工具，它大大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感，並且引入了現代時間概念，旅客必須依從鐵路所定下的時間節奏，根據時刻表乘車及規劃行程。這是伴隨現代性而來的對日常生活的規範。其次，《京奉路指南》的出版，不單是為了方便旅客利用鐵路進行活動，而且是為了推廣鐵路的應用，鼓勵旅行。京奉路局總辦陸緒聲在序中如此解釋出版目的：「各國鐵路皆有發明交通情事之紀載，所以謀路政之繁盛，便行旅之取携，用意良善」，他因而派人搜集資料，編成指南，「非敢謂振興路政之一端，

⁵⁵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91-92；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1997），頁 183-190。另可參考〔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的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1972），第六章，〈商業書にみる商人と商業〉，頁 287-324。

亦聊以報商旅之出於其塗者，俾日趨於便利而已」。⁵⁶序中特別指出「非敢謂振興路政」，恰恰反映此點非常重要，希望藉此彰顯京奉鐵路管理局在發展現代化交通網路的貢獻。為推廣鐵路運輸以增加盈利，京奉鐵路管理局當然希望更多旅客乘搭此鐵路。指南的序言亦反映了其針對的讀者為「商旅」，當中固然包括以旅遊閒暇為目的的旅客，但相信乘客中占多數仍是以商務為目的。不過由於北戴河並非商業重鎮，因而可以肯定乘火車到北戴河的旅客，絕大部份是為了解閒娛樂。上文提到，1914 年開闢北戴河海濱站，也是由於到當地避暑的旅客人數不斷增加。

京奉鐵路局為了商業利益，銳意推廣北戴河鐵路旅遊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在出版旅行指南之前，鐵路局曾製作一幅旅遊招貼廣告畫，畫中是一名身穿無袖上衣及短褲的女士，她打著太陽傘，悠閒地騎在驢上（附圖 4）。據說此圖是 1896 年英國傳教士甘林在別墅（即前文提到呂碧城於 1910 年到訪的房子）的落成典禮上，由甘林的一名友人即興創作。京奉鐵路總工程師金達把此畫作製作宣傳畫，在夏天張貼於各火車站及外國人居住的地域。女士騎驢的意象其後在不同媒體得到強化，例如一首題為「西女騎驢」的北戴河竹枝詞：「得得行來不用扶，倒騎側坐弄嬌軀，看她一樣纖纖質，華女如何魄力輸」。此作品載於管洛聲的《北戴河海濱志略》，為北戴河海濱竹枝詞 15 首之一，作者不詳，創作時間為「辛酉」，估計即 1921 年。同書亦刊載了京奉鐵路局女士騎驢的廣告畫，並名之為「仕女騎驢圖」。⁵⁷

1917 年北戴河海濱站落成，成為京奉鐵路 88 個車站之一。是年出版的《京奉路指南》，除了原有的北戴河站外，亦加入了北戴河海濱站的旅遊資料，不過只有聊聊數句：「北戴河海濱為中西人避暑之地，本支線係民國六年築成，自北戴河站至海濱站計長四十三里（按：此為華里），由北京天津奉天等站往

⁵⁶ 京奉鐵路管理局總務處編查課編，《京奉鐵路旅行指南》（天津：京奉鐵路管理局，1910），〈序言〉，頁 2。

⁵⁷ 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130、192。

海濱之游覽票只售頭等二等」。⁵⁸《京奉路指南》同時提醒讀者，北戴河並沒有旅館，不過每逢夏季，天津裕中洋飯館設在聯峰山的支店會兼營為旅館，接待旅客，「每日房飯洋六元，過時即閉」。可以想見，1910 年代在北戴河若沒有房舍別墅或親戚朋友接待，到當地旅遊並不方便。大概一般讀者不會因為《京奉路指南》中如此簡單的解說，而決定到北戴河旅遊，至於已有計畫到北戴河旅遊的人士，這些簡短的資料所能提供的幫助亦頗有限。

鑑於北戴河在 1910 年代的重大發展，包括北戴河海濱車站落成及中國人組成的公益會的成立，上海商務印書館在 1921 年出版《北戴河指南》便變得容易理解。當然，《北戴河指南》只是同時期出版的眾多旅遊指南之一。民國時期湧現大量旅遊指南，反映了旅遊文化的蓬勃，而當中不少由商務印書館及中國旅行社出版。⁵⁹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北戴河指南》是第一部專門為介紹北戴河而撰寫的中文旅遊指南，作者是徐珂。序言寫於 1921 年 6 月，可以假設指南亦是在 1921 年完成。徐珂為浙江杭縣（即杭州）人，1889 年成為舉人，曾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最為人熟識的著作是匯集了清朝各類掌故的《清稗類鈔》。除了《北戴河指南》外，他亦撰寫了多個地區的指南，包括《西湖遊覽指南》（1913）及《實用北京指南》（1920）等，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戴河指南》全書 76 頁，書後另附有 11 頁的《秦皇島指南》，徐珂解釋由於兩地相距甚近，「汽車頃刻可至，客之在河避暑者，輒以暇日往游」，因而同時收入《秦皇島指南》，以方便讀者。然而他亦承認，秦皇島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以北戴河而牽連及之，得聞於世」。那又為何多此一舉，為乏善可陳的秦皇島撰寫旅遊指南呢？原因是他期望秦皇島日後有所發展，「足以獨立於世，不必依附北戴河之末光，亦若吾之所望於吾政府吾人民也」。⁶⁰

⁵⁸ 京奉鐵路管理局總務處編查課編，《京奉鐵路旅行指南》，頁 58。

⁵⁹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2013 年出版了《民國旅遊指南彙刊》，共 56 冊，收錄了 1915 年至 1948 年間的旅遊指南共 87 種，雖然此收錄清單未必完備，但可以讓我們大致了解旅遊指南的出版情況。當中商務印書館是出版最多旅遊指南的出版社，占 12 種，其次是中國旅行社，有 11 種，中華書局則占 5 種。參見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王強、張元明主編，《民國旅遊指南彙刊》（江蘇：鳳凰出版社，2013）。

⁶⁰ 徐珂，《秦皇島指南》，序頁 1、頁 1，收入氏著，《北戴河指南》。

這句話顯然是徐珂針對北戴河得力於西方人開發，進而抒發內心的無奈及對中國未來的寄望。

《北戴河指南》提供的資料比《京奉路指南》詳細得多，當中包括北戴河的歷史、當地各類交通工具（包括汽車、驢車、馬車、人力車、轎子）的收費、旅館、酒館、浴堂的名稱、所在地及收費，以及北戴河的名勝及物產等。除了文字外，《北戴河指南》亦附有 22 幅北戴河各處的攝影圖片。這些資料是如何搜集得來的？現今的旅遊指南，作者往往標榜他們在當地旅遊的親身體驗和經歷。徐珂在《北戴河指南》中間接表明了他並沒有到過北戴河，他在凡例中說，指南中的資料「搜羅宏富，有採自古籍者，有譯自西文者」。我們可以推論，《北戴河指南》是由來自中國地方志及有關北戴河的英文資料匯集而成。因此，不單讀者通過《北戴河指南》想像北戴河，作者徐珂事實上也是通過第三者的資料來想像北戴河。然而，就如其他旅遊文本，《北戴河指南》的文化意義超越了個人的層面，它既參與塑造中國人對北戴河的集體想像，同時亦反映了 1910 及 20 年代中國人對西方海濱旅遊文化的選擇性接受。

首先，《北戴河指南》所呈現的北戴河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有何獨特之處？或更準確地說，它被賦予了什麼獨特的形象及地方感，使其有遊覽的價值？《北戴河指南》序言的第一句，便指出了北戴河的優越之處在於其臨海的地理位置：「海濱之地多爽塏，空氣恆潔，於夏尤宜」，因而是很理想的「海濱避暑之地」。而「我國海岸線之長，雖遜於英日，而欲求海濱避暑之地，易易耳，今乃惟以北戴河聞」。上文提到，傳統中國有「消夏」及「消暑」的概念。至於暫時離開居住地，到涼快的地方「避暑」，清皇室於夏天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是一個好例子。然而視海濱為避暑勝地的概念，在傳統中國並不存在。因而《北戴河指南》所推廣的是非常新穎的旅遊觀念（儘管呂碧城在 1910 年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倡到海濱避暑），並且把北戴河視為當時中國唯一的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指南》所提供的住宿資料，反映 1920 年代初的北戴河已出現較多的旅遊設施。旅客可在當地找到兩所常設的旅館，分別是位於東聯峰

山海濱的同福祥旅館，及西聯峰山海濱的金山旅館。選擇租屋的旅客亦可委託西方人組成的石嶺會代覓屋宇，因為一些在當地建了房屋的西籍住客會通過石嶺會把房屋出租。徐珂亦不諱言，到北戴河旅遊的都是「富貴中人」，此可見於往北戴河的火車票，只分頭等及二等，「以非避暑之人不往也，非富貴中人，亦安有閒暇以避暑耶」。⁶¹

《北戴河指南》雖然是一部旅遊指南，但徐珂並未視北戴河為純粹的休旅空間，在序中可見他為北戴河賦予的民族意義。他一方面慶幸西方人發現了北戴河：「為北戴河幸，幸其遇西人而得聞名於世也」，但另一方面，他亦如呂碧城一樣，認為中國人的地域要依賴西方人開闢經營，反映了中國民族性的缺憾：「何吾國人之乏自覺性，不為主動，而皆為被動耶」。他不單責備其他中國人缺乏自覺，也責怪自己後知後覺，到現在才為北戴河撰寫指南：「予至今日而始為北戴河指南，以諗游者，亦被動也可恥也」。⁶²徐珂認為北戴河標誌著中國人的被動與可恥，但亦強調華人在北戴河發展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指出「數年以來，華人之富者，亦爭往卜居，平治道途，氣象一新」。⁶³徐珂讚揚公益會在北戴河建築馬路、醫院，但並沒有視之為中國「爭主權」之舉。他指「華人西人經營之事業頗多」，視西方人及華人在經營北戴河上皆付出了努力。

徐珂形容北戴河為中國唯一「海濱避暑之地」，其引人入勝之處在於「風景之清曠，海岸之蜿蜒」。然而在《北戴河指南》中，有關海濱活動的篇幅不多。這與西方有關北戴河的旅遊介紹有極大差異，此反映了徐珂對西方文化的選擇性接受及推介。在西方海濱休旅文化中，其中一項極為重要的活動是海浴。自十八世紀開始，海浴被視為具有療病功效的活動，能夠令人精神振奮，因而在西方日漸流行。到海濱海浴及避暑成為深受資產階級歡迎的閒暇活動，後來亦在勞工階層中普及起來。上文提到刊登於 1899 年《北華捷報》的〈中

⁶¹ 徐珂，《北戴河指南》，頁 1、14、20-21。

⁶² 徐珂，《北戴河指南》，序頁 2。

⁶³ 徐珂，《北戴河指南》，頁 7、8。

國的療養地：北戴河》中，海浴是西方人在北戴河的重要活動之一（其他活動包括野餐、釣魚、騎驢、踏單車等）。作者強調海浴的醫療及娛樂功能，指海浴可以去除皮膚的皺紋，保持皮膚幼嫩。而在北戴河海浴有一可取之處，就是可以男女同浴（mixed bathing）。當時英國的一些海浴場，仍實行男女分泳。⁶⁴作者指出在北戴河，婦女在她們男性朋友的指導下學習游泳，他們在海水中無傷大雅地一起嬉戲，使在北戴河海浴成為一大樂事。

作者亦提醒泳者在北戴河要提防不速之客，就是那些在七月及八月聯群出現、會螫人的水母。不過作者認為不應過於誇大水母的殺傷力，並認為它們只在北戴河西面的海灘出現（當時西方人主要在北戴河東面的海灘活動），要找一處不受水母滋擾的海灘進行海浴並非難事。美國記者卡爾·克羅（Carl Crow, 1884-1945）在 1913 年出版的中國旅遊指南中，唯一提到的海浴地點是北戴河。克羅對北戴河推崇備至，指其海沙幼細，風景怡人，是深受旅居北京的外國人喜愛的消暑勝地。⁶⁵北戴河海浴的重要性亦見於不少西方人的遊記，例如英國畫家利德爾（Thomas Hodgson Liddell, 1860-1925）於 1908 年到中國各地旅遊及尋找繪畫靈感，其後把經歷寫成題為《帝國麗影》（*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的遊記，當中有關北戴河的章節，指出「海浴是極重要的事情，差不多所有在那裡的人都參與其中，海水頗為溫暖，因而人們留在海裡的時間比在英國海浴時略長」。⁶⁶

《北戴河指南》對於西方人所熱衷的海浴活動，卻只有聊聊數句的描述，指「海濱之可就浴者又甚多」，但並沒有提醒讀者在北戴河進行海浴時要注意的地方。⁶⁷徐珂指他參考了西文資料，因而他對西方人在北戴河的海浴活動一定不會陌生，只是很可能他認為中國人對海浴興趣不大。可見在 1920 年代初，

⁶⁴ 在第一次大戰前的英國，男女分泳十分普遍，不過一些泳池及海灘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開始容許男女一同游泳及海浴。見 Christopher Love, "Swimming and Gender in the Victorian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4: 5 (May 2007), pp. 598-599.

⁶⁵ Carl Crow, *The Travelers' Handbook for China*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News Co, 1913), p. 160.

⁶⁶ Thomas Hodgson Liddell, *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 (London: George Allen & Sons, 1909), p. 96.

⁶⁷ 徐珂，《北戴河指南》，頁 8。

中國人雖然緊緊跟隨著西方人的步伐，把北戴河視為旅遊及避暑勝景，但對西方海浴文化的接受算不上熱切。《北戴河指南》另有兩處提到「浴」，一是位於北戴河車站之西、提供沐浴設施的「浴堂」（名為輔海泉），二是北戴河附近的湯泉山中的溫泉，二者均不是海浴活動，亦非在海濱上進行。徐珂介紹湯泉山有湯泉寺，「寺外有泉，冬夏常溫，旁築小屋數楹，引泉為二池，就浴者多」，並且對此地的風景極為讚賞，指這裡「煙雲林壑，境絕幽邃，春季梨花盛開，一望如雪」。《北戴河指南》中的這些資料，與《（光緒）臨榆縣志》有關湯泉的描述以至遣詞造句也大同小異，顯然是抄錄。⁶⁸溫泉浴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不過《北戴河指南》對溫泉的形成為讀者提供科學的解釋：「泉水較其他溫度高且能保其溫度，或因地熱，或因含有礦物質而熱者，曰溫泉，一曰鑛泉，可治疾」。⁶⁹此是《北戴河指南》結合新舊知識的一個明顯例子。

在傳統中國，海洋既代表危險與不可預測，但海洋的雄偉浩瀚，又成為文人觀賞及歌詠的對象。簡單來說，「泛海」是令人畏懼的生死考驗，而「觀海」及「望海」，則可以開拓胸臆。⁷⁰《北戴河指南》反映了在 1920 年代初，西方的海濱休閒文化並未被中國人全盤接受，海灘仍然是宜於遠觀的大自然景觀，多於是遊樂的空間。徐珂亦從《臨榆縣志》轉引了不少詠嘆北戴河的詩詞，如清初詩人趙景徠的〈蓮蓬山觀海歌〉，當中有「海光山勢相爭雄、怒濤隱隱凌太空」之句。⁷¹北戴河的海洋勝景，還包括被乾隆《臨榆縣志》譽為「榆關十四景」之一的〈聯峰海市〉（即海市蜃樓）。《北戴河指南》從《臨榆縣志》中抄錄了明朝謝鵬南在聯峰山看到海市蜃樓後撰寫的〈海市記〉，並加上詳盡

⁶⁸ 《（光緒）臨榆縣志》有關湯泉山的記載如下：「湯泉山，在城西北六十里，有泉，冬夏常溫，建寺其旁，引泉為二池，浴之愈疾。煙雲林壑，境絕幽邃，春時梨花盛開，約十數畝，一望如雪，尤為大觀」。見《（光緒）臨榆縣志》，卷 6，輿地編 1，〈星野·疆界·形勝·山水（上）〉，頁 27。

⁶⁹ 徐珂，《北戴河指南》，頁 21、36。這數句有關溫泉形成的解釋並不見於《（光緒）臨榆縣志》。

⁷⁰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2（2008 年 3 月），頁 48-49；顏智英，〈論陸游的泛海書寫〉，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頁 71-94。

⁷¹ 徐珂，《北戴河指南》，頁 26。

的資料解釋海市蜃樓的形成原因。⁷²可見過去的地方志是《北戴河指南》的重要資料來源，過去的「勝景」觀念，仍然影響著民國時期的休旅文化。中國旅客到北戴河，他們所「消費」的，不單是自然景觀，還有這些自然景觀所承載的、由過去文人所賦予的歷史文化意義。通過過去一連串的人與景觀之間的互動，「自然地景」成為歷史文化記憶載體的「文化地景」，這同時亦增添了北戴河景觀的賞玩價值。

上文提到的尤班以法國為例子，認為到海濱的「渡假者」為的是停駐在海濱，而非到處尋幽探秘。但《北戴河指南》所展示的，並非靜態的海濱避暑文化，其所提供的遊覽資訊，以到北戴河附近的山嶺或河川遊山玩水為主，可見北戴河的玩賞性主要在於山巒，而不在於海濱。《北戴河指南》中有〈北戴河之名勝〉一章，當中介紹的名勝有被形容為「北戴河之最勝處」、依山而建的公園、聯峰山、臨榆山、尖山、南天門山、金山嘴、鴿子窩、湯泉山、背牛頂、勞嶺、西聯峰山上的仙人洞及蓮花石及聯峰山東的說話石。雖然《北戴河指南》有關勝景的描述多來自《臨榆縣志》，但地方志的目的只在於讓人知悉境內各地的名勝，而並非提供遊覽這些名勝的方法及資訊。而《北戴河指南》在這方面有異於過去的地方志，對旅遊路線及逗留時間作出詳細的建議，當中有 4 至 6 天的行程，旅客於晚上可在附近的寺院留宿。這些行程中在不少地方名字下以小字注明「譯音」，例如「高家甸譯音，大米集頭譯音」，反映這些資料是翻譯自外文的，筆者暫時未能確定其來源。旅客的行程及行程的節奏當然不一定由旅遊指南所主宰，然而毫無疑問，民國時期的旅遊指南的書寫目的及方法有異於過往的地方志及商人書，對旅客的旅遊經驗構成的影響較大。

到北戴河海浴，在華人社會逐漸成為重要的休旅活動，不同時期出版的北戴河指南，反映及參與造就了這個變化。上文指出，1921 年出版的《北戴河指南》並沒有向讀者介紹海浴活動，由公益會出版的《北戴河海濱志略》，在

⁷² 《（乾隆）臨榆縣志》，刊行於乾隆 21 年（1756）。當中有關「聯峰海市」的描述為「聯峰即蓮蓬山，蜃樓海市，土人往往見之」。收入山海關區舊志校注工作委員會編、時曉峰主編，《山海關歷代舊志校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頁 247。

「勝事彙記」篇則介紹了海浴的好處，指「能增皮膚之蒸發，利血液之循環，爽健精神，增進食慾，故病在滋養不足者，如神經弱病、皮膚病……皆可用之」。⁷³《北戴河海濱導遊》，不單介紹聯峰山的名勝及附近的山景，還特別推介讀者到海濱進行海浴，指「海水浴至有益於人，遊客若自問堪於一試，幸勿失此良機」。因為海水含有鹽分，「能清潔皮膚，殺滅菌類，故浴後精神爽適，食量大增」。若「海浴日浴風浴得同時行之，為益更大」。⁷⁴可見西方有關海浴療效的醫學論述逐漸為中國人接受，並通過旅遊指南向各界推廣。《北戴河海濱志略》及《北戴河海濱導遊》更附有地圖和圖片，清楚標示了聯峰山附近 3 個浴場的地理位置及浴場的面貌。這些圖像資料超越了文字的限制，讓讀者更具體地想像北戴河的空間及所能得到的旅遊體驗。⁷⁵

由於資料缺乏，我們難以考究讀者如何接收及利用旅遊指南中的內容，以及旅遊指南如何影響他們對旅遊北戴河的想像。我們惟有借助當時的報章資料，了解北戴河對一般民眾所負載的意義。從一些報章上的文章，可見在 1920 年代初開始，「北戴河」一詞已進入了普羅大眾的知識範疇，甚至成為階級差別的象徵。1923 年，上海《申報》題為〈熱談〉的一篇文章，認為消暑文化暴露了社會的不平等。作者說：「熱天最可以表現社會的不平等……那富商巨賈、政客官僚，北戴河咧、牯嶺咧，避暑的避暑去了」。⁷⁶1925 年《申報》的另一篇文章，向上海城市人介紹消暑的方法；指上海人口密集，工廠林立，空氣污濁，疾病容易傳播，因而向富人推介四個消暑地方，包括莫干山、北戴河、廬山及雞公山，⁷⁷當中只有北戴河位於海濱。至於沒有經濟條件離開城市避暑的「中產階級」，作者提議他們可以在居所附近搭建涼棚「邀月迎涼」，亦可與鄰里在涼棚下一起看看報、唱唱歌。這樣看來，難怪〈熱談〉的作者認為炎

⁷³ 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83。

⁷⁴ 北寧鐵路管理局、中國旅行社編印，《北戴河海濱導遊》，頁 4。

⁷⁵ 香港是最早接受海浴及游泳文化的華人社會，早於 1910 年代已設有公眾泳場，由於收費廉宜，不少華人民眾亦前往這些泳場游泳。見潘淑華、黃永豪，《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第一章，〈海浴的開始：海浴、殖民管治與海濱的開闢〉，頁 1-37。

⁷⁶ 無涯，〈熱談〉，《申報》，1923 年 7 月 22 日，第 8 版。

⁷⁷ 胡健行，〈上海人暑中消遣法〉，《申報》，1925 年 5 月 30 日，本埠增刊，第 5 版。

夏中消暑方式的差異，充分暴露了社會的不平等。西方的避暑文化形塑了中國人最理想的避暑方式的想像——到北戴河去！

然而，公益會在空間建置及景觀上，為北戴河的地方感帶來深刻的變化，其營造的休旅空間，除公園及寺院外，還包括將北戴河海濱的其中一段轉化為華人的海浴場所。這進一步改變了過往北戴河由西方人主宰的印象，使北戴河成為有多層意義的空間。北京大學歷史系女教授陳衡哲（1890-1976）在 1910 年代留學美國時學會了游泳，於 1926 年遊北戴河寫成了〈北戴河一周遊記〉；1932 年重遊舊地發表了〈再遊北戴河〉一文。後文中，起首便指出北戴河的特質：「提到北戴河，我們一定要聯想到兩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時髦」。然而她細緻地點出了北戴河不同地域蘊含的情感認同（affective identification）的差異。對喜愛游泳的她來說，在北戴河西面的公益會海浴場游泳的感覺特別愉快，這並非由於公益會海浴場的海沙或海水與別不同，而是在於她在這裡游泳獲得的民族自尊心。她寫道：

西部以聯峰山為中心點。住在那裏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國的富翁，與休養林泉的貴人。公益會即是他們辦的。我們雖然自度不配做那區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紅唇肥臂，或是禿頭油嘴，自命為天之驕子的白種人，我們便不由得要感謝這些年高望重，有勢有錢的公益先生們，感謝他們為我民族保存了一點自尊心。我們在公益會的浴場游泳時，心裏覺得自由，覺得比在中部浴場游泳時快樂得多了。⁷⁸

可見公益會所經營的空間，既象徵階級的排他性（因而陳衡哲說她「自度不配做那區域的居民」），卻同時發揮了民族認同的融和性，海浴空間成為了體驗民族情感的空間。陳衡哲的北戴河旅遊文章，進一步豐富了讀者對北戴河的想像。

⁷⁸ 陳衡哲，《陳衡哲散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 406、411-412。有關陳衡哲的生平，可參看陳怡伶，〈新知識女性的生命抉擇：陳衡哲的前半生（1890-1936）〉（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五、結 語

十九世紀末，在華西方人的休閒活動及現代交通建設促成海濱避暑文化在中國興起，並帶動海濱自然景觀及文化景觀的變化。自 1920 年代開始，北戴河被朱啓鈴的公益會經營成為城市上流人士消暑（及消費）的勝地。在短短三十多年間，西方人及中國人各自在北戴河海濱進行的各種規劃及建設，以及形形色色的旅遊指南和遊記，賦予北戴河多層「地方感」，令北戴河從不為人知的臨海「空間」，成為同時負載階級及民族意義的休旅「地方」。北戴河個案所反映的空間及地方感的見解，可歸納為以下數點。首先，空間及地方的意義並非永恆不變的，當中的建構過程展現了複雜的權力關係，包括西方人所憑藉的帝國主義力量，並及公益會所借助的北洋政府力量及民族主義論述。其次，不同群體根據自身的利益與文化需要規劃空間，並為北戴河的海濱空間賦予意義及地方感。北戴河在中國地圖上出現，絕非是冷冰冰的地理名詞，而是負載著西化、摩登、高尚、自由，甚至是中國人爭取民族尊嚴的載體。其三，「地方感」與個人體驗及感受息息相關，這種體驗及感受成為建立身分認同的基礎，徐志摩及陳衡哲的遊記便是佳例，而他們的遊記同時又參與北戴河「地方感」的再生產。其四，作為一種新興文體，旅遊指南也參與了地方感的塑造，為旅遊空間賦予了具體的性格和價值。從沒有到過北戴河避暑的城市民眾，可以通過旅遊指南想像北戴河海濱景觀及休旅文化。

北戴河的演變亦引申出中國近現代「城鄉關係」的重要課題。有關民國時期的城市研究，強調「城鄉斷裂」或「城鄉對立」。如上海等大城市象徵「摩登」與「文明」，標示著國家的將來，城市以外的地方則代表「貧窮」和「落後」。⁷⁹二十世紀都市文化的興起是不容置疑的，各種新式娛樂及消費文化在

⁷⁹ 例如 Joseph Esherick, “Modernity and N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in Joseph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 11.

城市湧現。⁸⁰及至 1930 年代「農村破產」出現，城市與鄉村往往被理解為文明——落後的二元對立關係。此觀點忽略了與這種二元對立同時存在的，是城市文化向周邊地區的延伸及兩者之間的互動。城市沒有固定的邊界，亦非孤立及自足的空間，而是不斷向四周延伸，海濱是展現這種關係的其中一個空間。海濱的發展與城市是息息相關的，海濱的變遷不單反映了城市的變化，而且由城市的變化所帶動。遠離城市但又通過現代鐵路交通網絡與城市接連起來的北戴河，成為西方人及中國城市菁英逃離悶熱的北京及天津的休旅場所，這反映了城市人的閒暇空間向城市周邊擴展。在城市編寫及印製的北戴河旅遊指南，製造並強化了旅遊的論述，為北戴河賦予了讓城市菁英逃避暑熱的存在意義，以及建構現代城市生活的空間與文化。因此，民國時期海濱及海浴所承載的「現代性」，可以讓我們反思「現代性」並非局限於城市。作為現代產物的海濱「原始感」，令城市人的現代生活變得完滿，而海浴也被中國人視為現代文明的一種表現形態，到海濱海浴成為體驗「摩登」生活及營造「摩登」身分的途徑之一。由此說明要超越「城鄉」二元對立之城市概念，才能充分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形成及城鄉關係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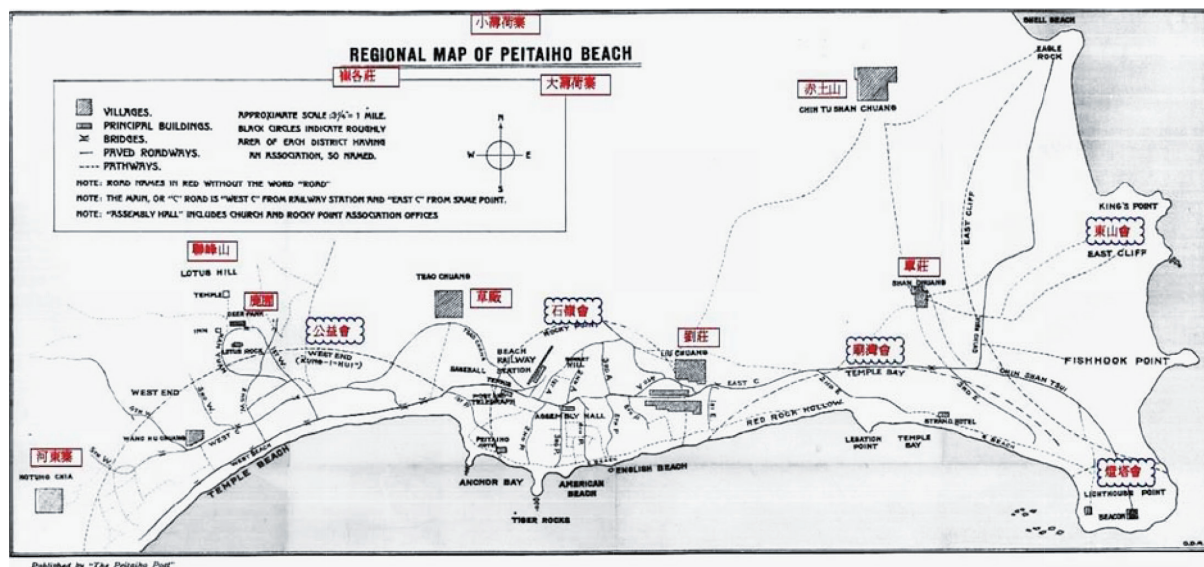
⁸⁰ 巫仁恕，〈導論：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收入巫仁恕、康豹（Paul Katz）、林美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 i-xv。

附圖 1 戴家河、聯峰山及各村莊位置



資料來源：《(光緒)臨榆縣志》，卷首，圖，頁8。

附圖 2 北戴河區域圖



資料來源：Peitaiho Directory 1924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4), 無頁碼。

附圖 3 北戴河海濱朱啟鈐銅像



資料來源：潘淑華攝於 2013 年 8 月 4 日。

附圖 4 仕女騎驢圖



資料來源：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頁 192。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外交部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申報》，1898，1906，1907，1909，1918，1919，1923，1925。
- 山海關區舊志校注工作委員會編、時曉峰主編，《山海關歷代舊志校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編印，《清代外債史資料（1853-1911）》，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88。
- 毛澤東，《毛澤東詩詞十八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 北寧鐵路管理局、中國旅行社編，《北戴河海濱導遊》，上海：中國旅行社，1935。
- 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編，《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報告書》，北戴河海濱公益會，1921。
- 京奉鐵路管理局總務處編查課編，《京奉鐵路旅行指南》，天津：京奉鐵路管理局，1910、1917。
- 林伯鑄，《北戴河海濱風景區志略》，收入鄭曉霞、張智主編，《中國園林名勝志叢刊》，冊4，揚州：廣陵書社，2006。
-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王強、張元明主編，《民國旅遊指南彙刊》，江蘇：鳳凰出版社，2013。
- 徐珂，《北戴河指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 高凌霨、仵墉修、程敏侯等纂，《（民國）臨榆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高錫嘯等纂高凌霨等重修民國18年（1929）鉛印本影印，1968。
- 管洛聲，《北戴河海濱志略》，河北：北戴河海濱公益會，1925。
- 趙允祉修、高錫嘯纂，《（光緒）臨榆縣志》，出版資訊不詳。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
- 蔡及煌編，《約章分類輯要》，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
- North China Herald*, 1894, 1898, 1899, 1924.
- Peitaiho Directory 1918*. Tientsin: Rocky Point Association, 1918.
- Peitaiho Directory 1924*.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4.

二、專著

- 〔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1972。
- 〔日〕畔柳昭雄，《海水浴と日本人》，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棗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興風雨》，收入《棗莊文史資料》，輯 19，棗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棗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近代人物錄》，天津：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總編輯室，1987。
-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魏子初編，《帝國主義與開灤煤礦》，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
- 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編委會，《北京交通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共河北省秦皇島市委統戰部編，《蠓公紀事——朱啓鈴先生生平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 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 張雨才編，《中國鐵道建設史略 1876-1949》，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7。
- 張瑞德，《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凌鴻勳編著，《中華鐵路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
- 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1997。
- 陳衡哲，《陳衡哲散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潘淑華、黃永豪，《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
- Crow, Carl. *The Travelers' Handbook for China*.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News Co, 1913.
- Corbin, Alain. *The Lure of the Sea: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Cresswell, Tim.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 Esherick, Joseph,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Gammon, Sean, and Sam Elkington, eds. *Landscapes of Leisure: Space, Place and Ident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Garner, Alice. *A Shifting Shore: Locals, Outsid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French Fishing Town, 1823-2000*.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Liddell, Thomas Hodgson. *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 London: George Allen & Sons, 1909.
- Mcleish, William. *A China Sanatorium: Peitaiho*. Shanghai, Publisher Unknown, 1899.

- Smith, D. Warren.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the Far East*.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900.
- Tiedemann, R. G.,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2: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 Urbain, Jean-Didier. *At the Bea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 Walton, John K. *The English Seaside Resort: A Social History, 1750-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三、論文

-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3。
- 呂碧城，〈北戴河遊記〉，《婦女時報》，期 1（1911 年 4 月），頁 31-36。
- 呂曉玲，〈近代避暑地華人自治管理探析——以北戴河海濱公益會為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7 期 5（2011 年 9 月），頁 70-75。
-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1（2003 年 9 月），頁 87-143。
- 馬樹華，〈海水浴場與民國時期青島的城市生活〉，《史學月刊》，2011 年第 5 期，頁 93-99。
- 陳怡伶，〈新知識女性的生命抉擇：陳衡哲的前半生（1890-1936）〉，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
- 崔 勇，〈朱啓鈴小傳〉，收入朱啓鈴著，崔勇、楊永生編選，〈營造論——暨朱啓鈴紀念文選〉，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頁 258-259。
- 黃嬌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集 5，頁 238-256。
- 趙 欣，〈1934 年—1948 年北戴河外籍人員管理研究〉，保定：河北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2010。
- 潘淑華，〈淺水灣：海濱、海浴與香港殖民地的空間政治〉，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頁 115-141。
- 顏智英，〈論陸游的泛海書寫〉，收入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編，〈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2013，頁 71-91。
- 徐志摩，〈北戴河海濱的幻想〉，《文學旬刊》，期 39（1924 年 6 月 21 日），頁 1-2。
-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期 32（2008 年 3 月），頁 41-71。

賴淑卿，〈呂碧城對西方保護動物運動的傳介——以《歐美之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期 23（2010 年 3 月），頁 79-118。

范純武，〈清末民初女詞人呂碧城與國際蔬食運動〉，《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105-113。

Gao, Yunxiang. "Beidaihe Beach, Leisure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Sport in Society: Cultures, Commerce, Media, Politics* 15:10, Dec. 2012, pp. 1353-1380.

Love, Christopher. "Swimming and Gender in the Victorian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4: 5 (May 2007), pp. 586-602.

The City and the Seaside: Constructing Leisure Culture and Space at Beidaihe, 1890s-1930s

Poon Shuk-wah^{*}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seaside and sea-bathing to the leisure culture of Chinese urban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rough a close study of Beidaihe. The most renowned seaside resort in North China, Beidaihe began to gain an iconic status in the late 1890s thanks to the newly-developed railway system. Attracted by its beautiful scenery and excellent qualities as a sea-bathing site, Westerners living in Tianjin and Beijing turned Beidaihe into an ideal seaside resort for escaping the summer heat. The nameless seaside “space”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place” endowed with a distinct cultural identity, and attracted some Chinese urban elites to come and seek control over the area. They founded the Beidaihe Seaside Welfare Association in 1918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u Qiqian, which managed to establish control in western Beidaihe and imbued the Western-style landscape of Beidaihe with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Guidebooks and travel writings further popularized the image of Beidaihe as an ideal seaside resort amo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the sense of place of Beidaihe reflected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ers, and helped shape the clas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urban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Keywords: Beidaihe, sea-bathing, Zhu Qiqian, Beidaihe Seaside Welfare Association, travel guide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